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主編：宋柏年 趙永新



澳門理工學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宋柏年 趙永新



澳門理工學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二〇〇二年十月

書 名：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 著：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

出 版： 澳門理工學院

排 版： 科教文出版社

印 刷： 文寶印務有限公司

印 數： 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9937 - 33 - 29 - 6

目 錄

在“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崔世安	1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	李向玉	2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辭	周經桂	3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總結發言	程祥徽	4
※ ※ ※		
澳門和中西文化交流與漢學的形成	閻純德	7
澳門與葡語國家的交流		
——葡萄牙大學協會(AULP)計劃	施曼堯(Manuel Coelho Silva)	14
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	吳義雄	19
“利瑪竇的佛教經文”初探	張西平	30
萬曆末年熊明遇筆下的歐洲三國	湯開建	45
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特殊傳媒	劉鑣力	68
中華文化之東傳與西域文化進入中土後之華化	趙文房	75
全方位的知識進路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西學東漸的成果之一探討	鄔昆如	79
認識的痛苦:西方對佛教的接受——巴黎讀書之二	錢林森	85
※ ※ ※		
社會變遷與文化交流	周清海	93
澳門文化在廿一世紀中國發展對外關係中的作用	魏美昌	100
澳門數學的過去、今天與未來	王 衛	109
澳門文化的精神家園	宋柏年	113
澳門多語多言現象的文化語言學思考	楊啓光	121
汪兆鏞與民初澳門學術——以《碑傳集三編》為中心	彭海鈴	128
澳門文學批評的文化特徵	李觀鼎	134
澳門在中國新聞史上的獨特地位	尹德剛	139
從澳門廟宇看澳門華人文化特色	徐曉望	145
澳門儼文化表現與澳門文化特徵	牛國玲	151

論澳門女性散文的文體特色	鄧駿捷	160
蓮的心——澳門觀音像設計者李潔蓮的中國情	趙 陽	165

※

※

※

陳子褒的教育思想	邱捷 顏遠志	169
陳濟棠治粵時期廣東海軍中的前駐澳葡艦	馬幼垣	177
港澳地區的語言、文化現狀	韓 樂	184
戈振東神父和他翻譯的《道德經》	姚京明	191
孟三德神父與澳門	崔維孝	195
名人與澳門——明清篇提要	賴少英	200
從漢英熟語探討宗教思想	王德春	202
中外文化交流與語言教學	黃政澄	215
澳門早期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及其特點	趙永新	222
葡國人的文化焦慮與前澳葡政府的文化政策	馮傾城	229
從澳門的法律翻譯看如何處理不同文化中的異質同構現象	李長森	238
漢文化與漢語文教學的關係	黃 翊	247

※

※

※

中西文化交流與舞劇《(澳門新娘》	徐 新	249
1725—1849 年澳門貿易額船探析	陳文源	254
澳門街道名稱的文化內涵	祝秉耀	266
語言使用的對比研究	杜學增	272
實體和位置：漢語名詞功能的分化	郭 銳	280
由簡而繁是文字發展的趨勢	陶天權	287
海納百川——唐代文化繁榮的啓示	彭慶生	289
澳門中學普通話教學之我見	劉雪瑩	297
辟語文教育新蹊徑——語文聽力訓練與測試芻議	李向群	300
粵方言的地方變體——澳門粵語	湯翠蘭	308
粵劇的興起及在粵港澳三地的發展	趙利峰	311

在“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2001年10月9日

社會文化司司長
崔世安博士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代表，
女士們、先生們：

本人很高興出席今天由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首先，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遠道而來的各位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感謝。

由於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文化傳承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並且有突出的地位。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十分重視本地區的文化事業，致力保護澳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及加強文化設施的建設。

今年七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因此，目前的首要工作是提高澳門居民的整體文化素質，以及加強文化建設，使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名城，並且推行廣泛的宣傳和推廣。

澳門理工學院長期以來在應用科學的教學、專業培訓工作，以及提高澳門整體文化質素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時，亦由於“理工”一直從事中葡語言文化、中英語言文化的教學工作，因此在開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具備一定的條件。

理工學院爲了要加強科研工作的力度，特別舉辦今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且成立中西文化研究所。本人相信，在中西文化交流、澳門文化特色等方面，一定能夠研究出優秀的成果，爲本地區的文化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最後，預祝這次的研討會圓滿成功！並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

2001 年 10 月 9 日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李向玉

尊敬的社會文化司崔世安司長：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天，澳門理工學院是群賢畢至，國內外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問題。我謹代表澳門理工學院，向崔世安司長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在百忙中親臨大會，並為即將成立的中西文化研究所揭匾；向遠道而來的及本澳專家學者，以及新聞界的朋友，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最誠摯的感謝！

衆所周知，澳門雖是蕞爾之地，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卻有著重要的地位。四百多年前，它已經成為中國與西方的商貿中心，是西方現代文明傳入中國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橋樑。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為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活躍在這個舞台上的羅明堅、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艾儒略等人，就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驅。他們不但把西方的數學、天文學、醫學、地理學以及音樂、戲劇、建築等傳入中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而且把中國的古代典籍、中國的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歐去，使儒家、道家的思想和經典流行於歐洲各國，一時掀起了“中國熱”、“漢學熱”。

基於上述的原因，澳門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內容豐富的歷史文化，吸引了衆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的趨勢，形成了內容獨特的學術研究領域。為了讓澳門以一個歷史文化名城的面目出現於世界，讓更多的人認識它的價值，瞭解它的文化內涵；為了在一個嶄新的世紀，讓世界的多元文化能夠交融、並存和發展，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關心它，研究它。這次盛會，各位學者提交了內容充實、見解獨到的論文，極大地豐富了這方面的研究。

為盡微薄之力，我們成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感謝澳門著名書法家林近先生為研究所題寫所名，感謝著名學者湯一介、樂黛云、李鵬翥、陳勝舜、吳志良慨允俯就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和名譽顧問。以後我們還會恭請在座的專家、學者出任客座研究員，指導和幫助我們開展研究工作。

最後，預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學者在澳生活愉快，謝謝大家。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辭

2001 年 10 月 10 日

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
周經桂

各位嘉賓、各位學者，
朋友們：

我們剛剛度過國慶、中秋佳節，來自內地、台灣、香港、新加坡和本澳的專家、學者又歡聚在小城——澳門，共同研討中外文化交流和澳門語言文化問題，為澳門，為理工學院又增添了學術氣氛。

這次學術研討會會期祇有一天半，收到論文 50 篇，有一百多人參加了開幕式，社會文化司崔世安司長親臨主禮，說明特區政府對會議的重視，這次會議在中山大學近代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漢學》等協辦單位的大力協助下，在教青局、文化局、澳門語言學會、澳門娛樂公司和各位專家學者的全力支持下，使會議開得很成功，請允許我代表理工學院理事會和全院師生員工向上述單位和個人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澳門由於她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及作用，一直受到內地、港台以及外國學者的關注，對她的早期歷史、文化和語言，她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的作用，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側面進行了探討和研究，我院自去年以來先後召開過兩次研討會，研討澳門的語言、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天，各地學者聚首一堂，繼續研究她的文化、語言及其交流，使我們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的層面更多，層次更高。剛才程祥徽教授已經作了全面的總結，我就不多說了。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之所以在專家學者和本澳各界的支持下召開學術研討會，我們不是好大喜功，走形式，而是想借這些機會，借學者們的經驗，把我們理工學院的科研工作帶動起來，搞上去。這次我們一共收到 50 篇論文，其中有 14 篇是我院教師撰寫的，佔會議論文的 35%，這是歷次學術會上，我院遞交論文最多的一次，儘管我們中的一些論文學術性還不夠高，但是，說明大家已經作出了努力，祇要我們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我想我們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水平會越來越高。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今後多關心，多支持我們理工的學術活動。

這次研討會是我院畢業典禮活動周活動的一部分，由於活動比較多，邀請的客人也比較多，會議準備比較倉猝，對大家的接待如有不周到之處，請大家多多包涵，會議結束後，請各位專家、學者繼續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盛會，觀光遊覽澳門的名勝，讓大家在小城度過美好的時光，並預祝大家回程一路平安。

謝謝大家。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總結發言

2001 年 10 月 10 日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
程祥徽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過各地學者們一天半緊張、熱烈而愉快的工作，現在已經接近尾聲。來自海峽兩岸四地和新加坡等地的近 70 位學者，在 10 場討論會上，宣讀了近 50 篇論文，並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一天半時間做了這麼多的事情，取得了這麼好的效果，說明這次研討會是一次高質素、高效率的研討會。研討會預設的目的已經達到。這次研討會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這是一個內容廣泛、主題鮮明、時間緊湊的研討會。

探討文化問題的研討會在澳門曾經開過不止一次。但是“澳門文化”這個話題既有很寬的廣度，又有很深的深度，不是一次兩次研討會可以解決的；而且即使某些問題取得了共識，得到了解決，還會不斷地有新的問題產生。這樣說來，文化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永恆的課題，澳門文化則是澳門學術界的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這次研討會絕不是以往同類會議的重復，而是在原有基礎上的一次創新。

這次研討會“內容廣泛”，“主題集中”，而且“時間緊湊”。會上宣讀和討論到的文章內容包括：1、早期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2、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3、中國文化與中外文化交流；4、語言教學與語言翻譯；5、社會與文化的關係；6、澳門文化與語言特色；7、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8、西方的漢學研究等等，顯示研討會全方位地研究了澳門文化的歷史與現狀。涉及的問題雖多，但主題卻相當集中。集中到研討會名稱所揭示的“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的主題上。

二、這是一個具有相當的學術深度的研討會。

相比於以往的研究，這次研討會對一些問題的研究更進一步走向深化。例如人們對澳門在東西方文化問題所處的地位向來“衆說紛紜”，有說“交融”或“融會”的，有說“交匯點”或“會通處”的，有說“通道”或“過道”的，有說“博物館”或“陳列室”的，有說“櫥窗”或“展廳”的，還有把澳門說成“文化拼盤”的。我覺得重要的不是名稱問題，而是實質是甚麼的問題，因此，“咬文嚼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是應該有充足的資料與科學的論證。我們高興地看到這次研討會上“西學東漸”、“東學西傳”方面的討論都有非常細緻的考察和微觀的統計。例如《關於葡語在明清文獻中使用的幾個問題》提到的“明清文獻中的葡語”可能是一座金礦，可供開發的礦藏十分豐富。

澳大一位研究生運用《澳門記略》的資料寫成很象樣的碩士論文，目前正在籌劃發展成爲博士論文。其實澳門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克里奧耳語——澳門語(lingua de Macau、Patois)，這次有論文提到，也是有待開發或搶救的遺產。

澳門文化研討逐步深化的一個重要成果是，經過多年的求證，目前到了給澳門這座小城定位的時候。一直以來，人們不滿意、或者不願意把澳門定位爲“賭城”，有的經濟學家提出種種經濟轉型的理論，認爲澳門要向工業、高科技方面發展。多年的經驗證明，澳門還是應當發展成爲文化城，學界有所謂“經濟香港”、“文化澳門”的說法。我看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在澳門的正確定位問題上以及今後如何在澳門把文化當作一項產業去經營，研究澳門文化的學者還要進一步轉換觀念。文化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與物質生活絕緣的所謂純精神的活動，而是應當使我們的研究貼近生活，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化爲實際的效益。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研究澳門文化的學者的擔子越來越重了。

三、這是一個重點突出的研討會，它把重點集中在澳門語言文化問題上。

會議的組織者始終把重點放在澳門的語言文化問題上面。我想這是主辦機構和協辦機構一致的需要——教學的需要，同時也是澳門社會的需要。這方面的論文不僅多，而且質量也高，尤其是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論文，更是以它豐富的語料和精湛的理論分析給人以新鮮的感受。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其中一個有待闡發的思想是，澳門不僅是歷史學家施展才華的地方，同時也是語言學家能夠充分用武之地。比如澳門的多語多言現象有它自身許多特點。香港 700 萬人口，是澳門人口的 16 倍，但它是所謂“兩文三語”社會，澳門人口比香港少得多，但語言狀況卻是“三文四語”，比香港複雜或豐富得多，值得研究的課題是大量的。以《澳門記略》爲資料的漢葡語言交流說明了這一點，本次研討會上的“吉祥語”研究也很有新意——在澳門這個博彩文化十分發達的城市，吉祥語大行其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許多博彩方面的言語成份已經由行業語進入全民語言，例如“一拖二”、“買大開小”、“熱門”、“爆冷”等等。這很值得作計量的微觀的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張清常教授以他的著作《胡同及其他》透過胡同名稱的研究寫出了一部北京的歷史，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語言學壇獨佔鰲頭，澳門街名系列的研究、土生的漢語教學、澳門粵語的研究，也因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一定能夠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感謝北京來的教授給我們帶來《澳門街道名稱反映的文化特點》。他帶來的不僅是一篇論文，而且是一個方向。

四、澳門文化還有許多值得研討的主題，這次研討會都有學者提及，例如陳子褒的教育思想，西洋觀音的文化意義，外國人如何看中國的廟宇、中國人如何看外國的教堂……這些論題都是很有學術價值的，因而也都是大有可爲的。

五、還必須感謝這次研討會的行政後勤人員所作的貢獻。他們的工作是高效率的，沒有他們付出的努力，研討會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們可以把短短一天半的研討會的收穫概括為以下三點：

- 1、交流了研究心得，開闊了學術的視野，啟發了代表們的思維；
- 2、結識了朋友，增進了友誼，打開了許多新的合作渠道；
- 3、看到了回歸後的澳門理工學院在特區政府領導下欣欣向榮的景象。

最後，我作為一個澳門人歡迎來自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的學者，希望澳門和澳門理工學院以及這次研討會給各位留下美好的回憶；同時作為這次研討會的一個被邀代表，感謝會議主人的精心安排和熱情款待，讓我們增長了見識，同時增強了我們之間友誼。

據說研討會後，澳門理工學院將要大興土木，改建和擴建校園，同時促使教學科研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我們真切希望你們取得成功，早見功效，來年我們再來澳門相聚，將會看到一個更加興旺、更加蒸蒸日上的高等學府。

澳門和中西文化交流及漢學的形成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閻純德

在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史上，往往因為一個人或因一件事或一個地方的作用和影響，便決定了社會和文化的走向，或是奠定了它的基礎。這種事屢見不鮮。

澳門地方不大，當初的耕作和商貿和文化，談不上發達或繁榮；但是，因為在數百年前，開始扮演東西方文化交匯點與橋樑的角色，而使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人們把它稱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通道和最早的橋樑，在漢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歐洲漢學成長的奶瓶的作用。

關於中西文化交流

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很長，但是對東方和西方影響最大的則是始於“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16世紀；而澳門，則是人類歷史上這個重要交流的驛站或基地。

人類為了生存，從很遙遠的童年時代就開始互相尋找，於是也就開始了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這種交流，除了同一種群的交流，更重要的還有各個不同民族和國家的交流：漢代張騫通西域，開通中國的陸路“絲綢之路”；明初鄭和(1371－1435)7次下西洋，開通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哥倫布(1451－1506)“發現”新大陸、麥哲倫(1480－1521)第一次繞地球一周等等，都是人類重要的經濟文化交流，這種“交流”幾乎覆蓋了整個人類的文明史。

文化交流有個過程——接近，碰撞，衝突，排斥，磨合，吸納和融合。融合後的文化是一種更有生命的新文化。文化交流，本質上是人類文化心理不斷成熟的結果。不同的文化，互相排斥的過程，也就是通過“過濾”，發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彼此之異同，“主體文化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客體文化加以“解釋和改造”，將其可以“接受與認同”的異質文化之精華，變“客體”為“主體”^①。這是一個人類“和而不同”的文化世界，這個世界由於燦爛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地球村將變得更加和諧而美好。

湯一介教授在引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的“軸心時代”的觀點時，論述了一個新的“軸心時代”的看法。遠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古希臘)、老子、孔子(中國)、釋迦牟尼(印度)和猶太教的先知，他們在彼此沒有影響的情況下，各自獨立創造了不同的文化，成為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財富：“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

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②我們人類文化的現代發展，依然是兩千多年前“軸心時代”的飛躍。這個新的軸心，將劃為歐美文化區、東亞文化區、南亞文化區、中東和北非的伊期蘭教文化區和猶太文化區。這個新的“軸心時代”與公元前 500 年前後的那個“軸心時代”不同，它們不再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在互相影響下多元共存，各種文化將由其吸收他種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決定其生存狀況和對人類文化貢獻的大小。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想見，一個沒有“導演”的多元文化共榮的世界，大概就是湯一介教授所說的新的“軸心時代”。

我不讚成所謂由於經濟“全球化”就會導致文化“一體化”或“一元化”的見解。任何社會都不會天地不分渾然一體，不會“一元之氣，具乎一物”；絕對是不存在的，而相對是絕對的。世界充滿了矛盾，高科技也無法把複雜的世界變成單一“色彩”，再優秀的文化也不可能取代或主宰他種文化的命運，有一種提法，文化“一體化”包括教育、文字、道德、法律、宗教等都要“一體化”，我認為這是一種主觀臆測。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守護神，有文字就有文化，甚至沒有文字也可以保留一種民族文化。“一體化”和“全球化”的概念不同。“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尤其是指商貿方面要在各自獨立的情況下，要受國際“遊戲規則”的約束；而“一體化”，則完全是指同一種機制下的一種模式。如果強制實施，天下就要大亂，經濟不能消滅文化，槍炮也不能消滅文化。

關於文化，季羨林先生提出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論點，我認為在世界文化史上，確實存在這種現象。我的理解是：世界上各種文化由於本民族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周邊及世界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都會出現其高漲期和低落期，一般說來，高漲期文化繁榮，經濟昌盛，國力強大，低潮期則相反。這種“文化時期”上的高潮期和低潮期，一般時間很長，短的有幾十年、幾百年，也可以上千年。這同經濟危機很有些相似，祇不過文化“危機”是漫長的，而經濟危機是短暫的。近數百年，文藝復興後，西方文化開始上昇，東方文化開始低落；而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文化伴隨著經濟的騰飛開始復興。我們可以謹慎地說，這 21 世紀，中國文化一定會對人類做出自己積極的貢獻。

關於人類的文化關係，季羨林先生用“拿來”和“送去”概括自古以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關係。他說：“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拿來與送去是兩個表面上似有矛盾而實則有緊密的辯證關係的概念和行動。拿來，就是把別國的文化精華拿了過來，為發展本國的文化提供活力。送去，就是把本國的文化精華送了出去，供別的國家發展自己的文化使用。兩個概念不是絕對的，以我為主就是拿來，以別國為主就是送去。二者有時候是難解難分的，拿來和送去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精華。”^③這就是人類文明的文化關係，是季先生關於文化的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的精妙論斷。季先生所說的“拿來的和送去的，不一定是精華”，此種情況是存在的，其個中原因也很複雜，一般說拿要拿好東西，送也要送好東西，可是有的拿者“崇洋媚外”，以為“凡是洋的就是好的”，於是被

人唾棄的糟粕也視為寶貝；而送者除非懷有其它企圖，否則為甚麼不送好東西呢？

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在這裏，關鍵是一個‘交’字，一邊倒，向一邊流，不能稱為‘交流’。古往今來，地球上不知道有過多少國家，多少民族，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創造。文化不論大小，一旦出現就必然向外流佈。我認為，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個特點，全體人類都蒙受了這個特點之利。如果沒有文化交流，我們簡直無法想象，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世界，文化會是一個甚麼樣子，人民生活水平會是一個甚麼樣子。”“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國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國家。從蒙昧的遠古起，幾乎是從一有文化起，中國文化就有外來的成分。中國古書上說：‘有容乃大’。中國人民是最‘有容’的，我們肯於和善於吸收外來的好東西，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祇要對我有利，我們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為大。我們能吸收各種文化，所以才能創造出這樣光輝燦爛的文化。”^④

在歷史上，中國吸納過別人的文化，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並發展成為中國佛教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接受與發展的例子。當然，中國文化通過絲綢之路也為西方文明開了一扇窗口，中國的四大發明對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種開發，中國哲學對西方的啟蒙運動也有過作用，中國文化，尤其是以儒學為主的傳統文化，至今還為東亞和西方所青睞。但是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學習、借鑑其它民族文化的問題：因為每個民族和國家，其文化都有自己的優點，同時也有自己的局限。

但是，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人類歷史上還有一層意思和結果：——碰撞，就是矛盾和鬥爭；融合的過程，也含有一種不可抗拒的以大凌小、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地逐漸消解對方的過程（當然，這種可能祇會發生在局部，發生在人數較小的弱小民族之中，或是沒有文字承傳的，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相對落後的民族之中）。就是說，一種強大的文化逐漸取代某個弱小民族的文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文化的民族性而增強多元文化的共性是不可能的。

從 16 世紀始，迄於當今，中國和西方之間發生的“西學東漸”和“漢風西傳”，即中西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史上偉大事件。而在一偉大事件中，扮演“帶頭羊”的是葡萄牙。雖然，葡萄牙以及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法國、荷蘭、俄羅斯等國家先後東來都懷有“殖民”動機，給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但客觀上，確實也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在 16 世紀之前，東西方的商貿交流多，而真正的文化交流少。自葡萄牙人東來之後，以澳門為基地，西方文化主要通過耶穌會士開始大量傳入中國，開始了實質性的“西學東漸”，同時也實質性地開始了“中學西傳”。在這種交流中，葡萄牙走在前頭，耶穌會士功不可沒，而澳門則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關於澳門與漢學的形成

一

在人類文化史上，漢學是一種獨立的學問，它既影響外國文化，也影響中國文化。“漢學是外國人瞭解中國文化的一座橋樑，是漫長的中國歷史文化和外國的歷史文化

撞擊之後而派生出來的一種學問，通俗地說，漢學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兒。中國文化是一道奔騰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帶著中國文化的光輝影響世界；流出去的‘活水’吸納異國文化的智慧之後，形成既有中國文化的因子，又有異質文化的思維的一種文化，這就是漢學。漢學是以中國文化為原料，經過另一種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種文化。”^⑤

文化交流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交流”拓展了人類的文明認知。但這種文化關係的形成是有條件的，衆多的因素會影響它的發展。而澳門，歷史為地西方漢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歷史條件。

人類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有主動和被動之分。大風傳播種子，蜜蜂轉播花粉，是無意而為之，人類活動雖然具有目的，但目的之外往往涵蘊著其它重要意義。比如，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雖是為瞭解世界和商業目的，但實際上通過中國的絲綢、茶、黃金、瓷器、漆器、香料等，將中國文化傳播到中亞和歐洲；耶穌會士來華，最初是為傳教（當然，有的也肩負著“殖民”的任務），但無意中卻正式拉開了“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偉大篇章。

文化交流需要渠道，沒有渠道就無法交流。13世紀初，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締造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當時的元大都（北京）已經聚集了不少匈牙利、意大利、法國、英國、俄羅斯等歐亞各國的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在經商、傳教和外交活動中，中西文化交流已經相當活躍。意大利商人和學者雅各·德安可納早在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就到達了中國福建的光明之城——泉州，並寫下了遊記《光明之城》，記述了許多宋末的經濟、文化、宗教等社會情況。自從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意大利出版了被稱為奇書的《馬可·波羅遊記》和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出版了《鄂多立克東遊錄》之後，不僅讓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眼福大飽，而且還使具有無窮誘惑力的中國更添加了許多神秘，於是中國成為歐洲人眼中的經商和旅遊的最好去處。在此前後，一小批到中國的歐洲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先後撰寫了不少“遊記”，他們簡約地對中國的歷史狀況、風土人情、山川河流、城鄉風貌等方方面面進行了或客觀如實的描述，或幻想式誤讀式的報導，雖然尚不是學術上的嚴格考察和研究，但總之是塑造了中國的形象，通過介紹中國，向西方傳達了不少中國文化的信息。這些“遊記”除了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之外，還有如亞美尼亞人契茨可思·岡紮克賽（Kirakos Ganjakeci）的《海屯行記》、意大利人約翰·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的《柏朗嘉賓行記》、利馬竇的《中國札記》、南懷仁的《中國皇帝出遊西轡軛行記》、李明的《關於中國現狀的新回憶錄》、葡萄牙人托雷·波萊茲（Tome Pires）的《東方志》、柏萊拉的《中國報導》等^⑥，以遊記文學形式講述關於中國見聞的書籍浩如煙海，其歷史可以從紀元前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424年）算起，直到今天的21世紀，真如奔流不息的長江之水，從來沒有斷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遊記作為文化溝通和交流的前驅，便成為：“中外文化直面碰撞的最初成果”，“西方人所獲得的中國知識和中國形象是由這些遊記提供

的”^⑦。尤其像利馬竇、金尼閣、衛匡國、南懷仁、李明等耶穌會士的遊記及其他著作，都是漢學學科建立的奠基之作。因此，我們說遊記其實是漢學最早的母體，在東西文化交流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張西平教授把它稱為“遊記漢學”，也不無道理。

二

16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海洋世紀。從那個世紀起，人類開始了近代文明的不倦跋涉；同時，漢學也伴隨著中西文化的頻繁交流與加強而開始了實質性的發展。

經過文藝復興洗禮的歐洲，16世紀的經濟正在迅速發展，並急於向外拓展，於是人類也正面臨經歷野蠻殖民主義劫難的時代。在當時，歐洲的主要國家，都急於瞭解外面的世界、向外發展，尤其急於瞭解中國。葡萄牙和西班牙屬於歐洲海上強國，而前者優勢尤強。1508年4月，葡萄牙國王瑪紐爾(D·Manuell)在給其遠東艦隊司令的訓令中說：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馬六甲……帶來甚麼貨？每年來多少船？他們的船型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夫還是勇士？他們擁有無武器或火炮嗎？他們穿甚麼衣服？……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是否一個大國？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尊奉他們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Moors)或其它民族同他們一道居住？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那他們信奉甚麼？崇拜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家延伸到甚麼地方？與何國接壤？”^⑧

這一連串的問題，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西方各國強烈要求全面瞭解中國的慾望和情緒。為了尋找中國，1487年開始，帶著槍炮的葡萄牙人的貿易“商船”，第一個駛出了歐洲的港灣，乘風破浪地走在整個歐洲擴張的最前邊。葡萄牙人克服千難萬險，先後數次繞過非洲好望角，擊潰土耳其、阿拉伯及印度的部隊，佔領了紅海入口旁的索克特拉島、波斯灣入口處的忽魯謨斯和印度的果阿，控制了前往中國道路上的制海權。1511年的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佔領了亞洲的馬六甲不久，他們的“商船”便停靠在中國的大門口，要求與中國進行貿易。出於無奈，明朝政府不得不允許葡萄牙對華貿易，還答應將澳門租居給葡萄牙。從此，澳門便成為歐洲人和耶穌會士相繼東來經商、旅行和傳教的必經之地和落腳點。當時，耶穌會士帶來了“西學東漸”，也帶去了“中學西傳”，使澳門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通道和最早的橋樑，為歐洲漢學成長奠定了基礎，也就是說，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著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出於澳門在宗教方面的特權和作用，人們把它稱為東方的“梵蒂岡”。

耶穌會士是由歐洲各國政府、羅馬教廷和耶穌會派往國外進行傳教活動的，因此他們既有傳教佈道使其異國民眾歸化的任務，也有“殖民”的任務，但與其同時，耶穌會士也為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自從1541年葡萄牙耶穌會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

1506－1552)奉葡王若奧三世派遣,並以教皇保羅三世使者的身份來華傳教,於1594年創辦聖保祿學院(Colegio de S·Paolo),該學院在日後168年的歷史裏,一直是宗教的東方聖地和歐洲耶穌會士的集散地及培養高級人才的重鎮。以澳門為舞臺,他們一方面在中國(以及日本、越南、泰國和柬埔寨)佈道傳教,一方面也無意有意地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許多工作,為漢學真正浮出西方地平線打下了基礎。^⑨

開通從歐洲至中國的海上航道,是西歐各國的共同願望。但是當葡萄牙開通了這條航線之後,便獨霸航道,不肯利益共享。於是,西班牙為了尋找中國,祇好從另一條海道探索達至中國之路,結果麥哲倫才意外地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荷蘭企圖從北冰洋來中國卻屢遭失敗。根據1494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簽訂的托爾德錫拉斯條約和1529年的薩拉戈薩條約,同意葡萄牙對東方航線擁有壟斷權。另外,根據教皇格列高利13世和克來門8世曾明令規定:葡萄牙在東方享有保教權。“壟斷權”和“保教權”使葡萄牙成為當時歐洲的強國。保教權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其一,任何從歐洲到亞洲的傳教士必須取道里斯本,並獲得里斯本宮廷的批准,這一特權使葡萄牙國王擁有了保教的一把鋒利無比、法力無邊的“尚方”寶劍;其二,葡萄牙國王不但有權建築教堂、派遣傳教士和管轄主教掌管領地的教會,而且有權分派神父和勞作者到建在獨立於葡萄牙之外的亞洲異教國家的教會去工作。由於梵蒂岡的嚴格規定,歐洲東來的耶穌會士,基本上都要經過里斯本乘船到外國。那些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士,都得先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中文,瞭解中國風俗習慣等文化知識,做了充分準備之後,才可以到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從明末至清初(1581－1740年),就有483名耶穌會士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其它教派的傳教士大多也集中於澳門,出出進進,不僅使澳門成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心,更使其在歐洲漢學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羅明堅、利瑪竇、巴範濟、湯若望、曾德昭、南懷仁、艾儒略·畢方濟、柏應理、金尼閣、李明等,這些歐洲漢學的奠基人,都同澳門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由於澳門,他們才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走向對中國的認知和研究,並把一個真正的古老而永遠神奇的中國及其文化,置於歐洲人的視野及其研究之中,並築起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漢學聖殿。

從16至18世紀,澳門聖保祿學院作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重要基地,它所培養的優秀耶穌會士,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歷史貢獻。

從聖保祿學院畢業的修士入華之後,大都成了傳教骨干,不少還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著述立說,出版衆多研究成果,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有些人進入北京宮廷,按照學歷獲得適當官職,如湯若望就曾先後被大清皇帝任命為清政府欽天監正、通義大夫等,還封他為“通為教師”等。^⑩

從漢學的萌生到漢學的成熟,經歷了應該漫長的東西文化交流時期。而澳門對於西方漢學的形成意義重大,可以說澳門是漢學最早的一個搖籃。